

譚延闓通而有節

章君毅

休休有容宰輔氣度



辛亥以前，任職湖南，首任譚延闓。

抱武侯兩句話

為民國一完人

上聯，是故監察院長于右任，

在民國十九年秋，輓故前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先生之作，據追隨譚延闓有年，送曾在中外雜誌有佳構發表的胡遜園先生說：「為最能盡先生之一生行藏者。」于故院長所指諸葛亮的兩句話，不問可知是為：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然而，譚故主席的一生，却是在淡泊之中具見尊榮，寧靜之中送現絢爛。和譚延闓訂交二三十年，允稱莫又，又是譚氏前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胡漢民先生，即曾分析過譚氏的為人性格說：

「譚先生『休休有容』，具有古人所謂宰輔的氣度。他的性格，祇有『和平中正』四個字，可以得其大略

譚延闓通而有則

。兄弟與譚先生相處十餘年，從未見其疾言厲色。有時，有人爲什麼問題互相爭執，譚先生一來，往往令人氣消。遇到難以解決的事，一經譚先生區處，也就十分妥貼了。所以有人視譚先生爲藥中甘草，幾於攸往咸宜。但是譚先生在我們工作中，不僅爲隨便配合的甘草，而是在配合之後，能使我們的工作，發生偉大的效能，顯出異常適當的工作的。這一點，凡屬於中央政情的同志，一定已有深切的認識。」

「休休有容」，典故出在書經上的「其心休休焉，其爲有容焉」，形容一個人的氣度寬宏。譚延闓的氣度寬宏當然是舉世所公認，不容置疑，毫無異議的，胡漢民也曾公開語人，譚先生的字典裏沒有名望和權利的字眼，他是真正能够身體力行 國父「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的。可是，我們總覺得譚延闓的一生行誼，在在超乎「休休有容」之上，他可以說是業已臻及「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超然境界，而且，他立身處世，確能做到「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對於進退出處，既有自知之明，更能知人善任。因此他是一位認得清大局趨勢，拿得出通盤方案的領袖人物，於人於己全無畛域之見，祇求大功大業之完成，於前賢中他很像曾國藩，在革命先進中他無疑的是在步武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後塵。

有兩件譚延闓的軼聞軼事，足以證明上說之並非溢美之詞。

民國七年十月十日，徐世昌繼馮國璋而爲大總統，他久慕譚延闓之名，曾經邀他從湖南北上，出任內務總長。譚延闓拍了個電報去婉謝不就。到了十二年十月十日北洋直系領袖曹錕賄選告成功，在北平沐猴而冠，又曾懇邀譚延闓入閣，這一次他却連覆電辭謝都給免了，乾脆置之不理，他祇是很瀟灑的語人云：

「徐東海（徐世昌字菊人，號東海）還可以與談書畫，曹老三，可太不識相了。」

兩句話，褒貶兩位北洋大奸佬，真是妙到毫顛，入木三分。尤其是「罵」布販曹三（錕）的那一句，更是絕不容情，語氣之重，對曹三來說，何啻重重一擱，劈頭澆下一盆冷水來。——像這樣疾惡如仇，大義凜然的

嚴正態度，不是藥中甘草，好好先生所可以表示得出來的。

第二個故事則發生在民國十七年一月初，一月二十五日，胡漢民國民政府主席出國考察，二月七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推選譚延闓爲國民政府主席。同年九月三日胡漢民自歐洲返國，向中央各同志建議成立五院，有以適應訓政建設之需要。就在中央籌議成立五院時期，譚延闓覺得他很適宜主持考試院，他竟忘却了自己身爲國家元首的地位，有一天他很誠懇的對胡漢民說：

「假如我還能服務黨國，可否給我做做考試方面的事情呢？」

是名公子亦名進士

這個問題當然不是胡漢民所可以決定得了的。十月一日國民黨中常會開會，議決推請今總統 蔣公爲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長行政；胡漢民長立法，王寵惠爲司法院長，戴傳賢長考試，蔡元培長監察。譚延闓的考試院長沒有做成，他仍還是遵照中央的決議，慨然不辭，切心爲行政工作而努力。胡漢民曾讚揚他說：

「這種鞠躬盡瘁，效死黨國的精神，真可爲今日一切專事奔競的青年同志的模範，而專爲發洩支配慾領袖慾，遂至不惜賣身投靠，殘民以逞的所謂老同志，也應該聞而生愧了。」

他所指的「賣身投靠，殘民以逞」的所謂老同志，當然係指朝秦暮楚，翻手的雲覆手雨，最後竟至淪爲漢奸的汪精衛了。

譚延闓，號組菴，又作組盒、組安，湖南茶陵人，遜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農曆十二月十四日誕生，是遜清進士，加太子少保銜，迭任陝甘總督、閩浙總督、兼署福州將軍、四川總督、兩廣總督的譚文勤公譚鍾麟的第三子。譚延闓天資聰敏，自小便以善於爲文，被士林所稱揚，他少年時代文字的精到練達，爲一般士子所

無法企及，所以見到他的都說，他將來必成大器。而且，從他出生之年起，他便隨譚文勤公同在任所，由杭州而河南、陝西、甘肅、北京、浙江、福建、廣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外，尤能耳聞目覩譚文勤公恤流亡、理獄訟、清賦稅、平亂事，尤其他在陝西巡撫，和陝甘總督任內，籌辦糧餉，支援左宗棠大軍西征，平回亂而定新疆，譚文勤公素有能吏之稱，早在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譚文勤公任陝西巡撫時，左宗棠即已專摺保奏，說他：

一、數年年百姓綏靖，糧輝不匱，臣得一意軍事，無兼顧憂，皆鍾麟力。」

譚文勤公的興利革弊，力任艱鉅，在譚延闓的心目之中，當然留有深刻的印象，凡此珍貴的見聞與體驗，都不是尋常人等所可以倖致的。譚文勤公在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初任陝甘總督，方抵任所，便得了眼病，他曾四度奏請解任，都被清廷賞假慰留，欽賜珍藥。到了光緒十四年時（一八八八），目疾益劇，幾乎看不見了，清廷方始准他開缺回籍，安心調理，兩年後，居然天佑斯人，兩眼復明。於是十七年（一八九一）二月，譚文勤公又奉治入都，賜紫禁城騎馬，以尚書銜補吏部左侍郎、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十八年（一八九二）授工部尚書，到同年五月授閩浙總督時為止，這一次，譚延闓隨他父親在北京住了一年多，開了不少眼界，也大大的長了見識。再從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到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將近五年他在譚文勤公的兩廣總督任所，胡漢民是廣州市人（廣東番禺），他從小到大都在廣州，以至於求學，奔走革命。對於民國以前廣州的情形不用說是很熟悉的，因此胡漢民說過：

「（譚先生）少時，在兩廣督撫幕中，遇到疑難的公事為他人所不解的，祇有譚先生瞭若指掌，而且區處條理，都能恰合分際。」

譚延闓在廣東督署，正值十六歲到二十歲的英年，他就已經能夠協助乃父處理公務，剖析疑難，真不愧有

清末名公子之名。但是譚延闓青年時代的成就還不止此，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他參加滿清——專制時代最末一科科舉考試，以二十六歲的一名青年舉子，竟然中了甲辰會試的會元，也就是會試第一名，爲湖南人爭取莫大的榮耀，使三湘父老爲之歡欣雀躍。

原來，科舉時代，講究的是三考出身，兩榜進士。所謂三考，便是府考，取錄的得秀才，鄉試，中了的稱舉人，和會試，中了的先名之曰「貢生」，再通過殿試，殿試取一甲三名，那就是狀元，榜眼和探花，都「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又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

就在這四級制的考試中，考秀才的府試不論，考舉人的鄉試，得了第一名的稱解元，考貢生的會試，得了第一名的稱會元，考進士的殿試，得了第一名則稱狀元。所謂「連中三元」的吉利話，便指連中解元、會元、狀元而來。事實上，舉全國數十萬讀書士子，數萬秀才，數千舉人，數百進士，要想四次考試回回掄元，三度大魁天下，那當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清一代，垂二百六十八年，連中三元的特殊幸運者，在一百一十二科科舉考試，一百一十二位狀元裏面，就祇有乾隆年間的蘇州人錢棨，字振威，號湘齡，曾經連中解元，會元和狀元，乾隆皇帝爲此非常高興，曾經爲他特作御製「三元詩」，以誌國家的祥瑞。再則，便是嘉慶年間的一位廣西人陳繼昌了。

科舉功名有否運氣

湖南一省，文風素盛，可是在滿清一百一十二科中，三鼎甲，亦即狀元、榜眼、探花，乃至解元，全都由湖南人一中再中過了，唯獨欠缺一位會元，而爲三湘人士認係莫大的遺憾。尤其是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戊戌政變百日維新，清廷曾經一度停過科舉，到了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恢復舉行，朝野人士誰都知道

這一次恩正併科過後，持續一千餘年的科舉取士之制，馬上就要廢止了。所謂正科，係指三年一試，恩科呢，則係朝廷因有特殊慶典而隨時開科的，光緒三十年陰曆十月初十，恰好是慈禧過七十大壽，所以這一年的一科，也就稱爲「恩正併科」了。

會試的大主考，係由清廷指定四位朝廷重臣担任，甲辰那一科的四位大主考是協辦大學士裕德（滿洲正白旗人），管學大臣張百熙（湖南長沙人），署工部尚書陸潤庠（蘇州人），法部尚書，參預政務大臣戴鴻慈（廣東南海人）。這四位大主考的籍貫分佈是華北一、華中一、華東一、華南一。同時也是按照清廷掄才大典的慣例，暗中有着「正大光明」的次序。換言之，「正」是裕德，他有權決定會元——第一名的人選，「大」是張百熙，照例他祇有會魁——第二名的決定權，以此類推，陸潤庠、戴鴻慈就只能取決第三四名了。

由於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役，北京的貢院，被八國聯軍縱火燒了。清廷有錢給慈禧窮奢極侈的辦七十大壽，却一連三四年籌不出款來重建這座全國士子心嚮往之，夢寐以求的全國最高試場。於是，光緒二十九年的順天鄉試，和光緒三十年的甲辰會試，便不得不暫借河南開封的貢院舉行。那一年，從全國各地到開封赴試的舉子，有陝西于右任、山西賈景德，湖南譚延闓，還有台灣的末代舉人高選擇。

這一次會試的結果，是譚延闓獨佔鰲頭，中了會元。使湖南一省，在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一百十二科科舉考試裏，三鼎里齊全之外，又復連中三元，彌補了獨乏一位會元的遺憾。無怪消息傳出，三湘人士歡欣若狂，熱烈慶祝，而譚延闓也成了舉國聞名的人物。他中會元的光采，居然還在殿試過後，這一科的狀元郎，第一甲第一名的劉春霖之上。

可是，科舉時代，向有「窗下莫言命，場中莫論文」，和所謂「一財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的說法。照這個說法一分析，竟是命運第一，文字在次。本來嘛，科舉時代只要能夠中了舉人，敢於晉京會試，當然

都是些「十載寒窗，磨穿鐵硯」，具有真才實學的讀書人，程度相差不到那裏去。更由於考試的範圍窄，取錄的標準大致揣摩得出，碰運氣成份，要比如今的大專聯考多得多，因此就不能不談運氣如何了。例如，就在甲辰這一科的殿試，八位閱卷大臣進呈的前十名卷子，原是狀元朱汝珍、榜眼劉春霖、探花金梁，傳臚張啓後。等到慈禧拆開狀元郎那本卷子的彌封一看，姓名朱汝珍，籍貫廣東，字體是重筆，也就是筆劃較粗。當時慈禧正為庚子那下令推珍妃入井，香消玉殞，因為心有內愧而不時鬧鬼，她見了朱汝珍的「珍」字便是心中一緊，加以廣東人之中有革命領袖孫中山，保皇黨魁康有為、梁啟超，又是犯她的忌。再則她自己的字跡寫的是「細筆」，見了「重筆」便不喜。於是她再看預選為榜眼的卷子，一看劉春霖用的是細筆，勁秀疏淡，又值甲辰那年北方正鬧旱災，她以為「春霖」兩字很吉利，便將狀元和榜眼的次序給對調了一下。此外，據遜清內務府大臣金梁在他所著的「光宣小記」中自己這麼說：那一科最倒霉的得算是他了，他說他原被閱卷大臣取為探花，筆迹尤其疏淡瘦硬，照說他這個探花郎準定通得過。然而，他錯不該在策首用了「痛哭流涕」四個字，那年正是慈禧七十初度，她認為大非吉兆，老大不高興的把卷子往地下一摔，左右內侍見慈禧老佛爺動了氣，連忙在另外七本卷子裏，找出一名旗籍的商衍鎰，抵了那原定探花金梁的缺。

清代三湘唯一會元

無巧不成書，甲辰那科的會元，據說也有一段幕後掌故。這段掌故係由遜清遺老陳夔龍，在民國十三年所發表的「夢蕉亭雜記」中透露出來的。大意是說：甲辰那年開封會試，他正當河南巡撫，因此他也被派為考官之一。考試揭曉的那一天，考官們齊集公堂，升座、拆卷、填榜。大家正在忙碌，會試大主考陸潤庠，手裏拿着一本卷子告訴他說：

「這本卷子書法工整，通場無出其右者，殿試時，可能大魁有望。」

他說時順手將卷子上的彌封拆開，大家好奇的擠上去一看，舉子的名字是劉春霖。當時，就有一位劉春霖的同鄉考官閻志廉說：

「劉春霖的字的確很出名，他平日所寫的大卷，就不下數十本之多。」

他是在說劉春霖爲準備殿試，練習殿試大卷的書法，就用了這麼多的功夫。

衆考官正欣賞稱羨，讚不絕口。另一位大主考湖南長沙張百熙，也指着一本卷子，洋洋得意的在跟那位河南巡撫陳夔龍說：

「我們湖南自從國朝定鼎，二百六十來年，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齊全，解元也得了不少，就只差一位會元。正好我在場中看到湖南省舉子的一卷，寫作俱佳，確實够得上會元之選。可是按照『正大光明』的次序而論，我班次第二，就只能取個會魁。科舉將停，機會難再，所以我特地跟裕相（按指協辦大學士裕德）情商，請他將這本卷子作爲會元，也好免使我湘科名有個會元的缺陷。承蒙裕相允讓，你看，這一本就是會元卷子了。」

說完，他當着陳夔龍的面，把手裏的那本會元卷子上的彌封拆開，兩人忙不迭的看時，卷上的姓名恰是湖南茶陵譚延闓。

有幸，當然也就有不幸者。甲辰那科會試，照例係由「正」字號大主考裕德決定會元人選，他在張百熙力請以湖南一卷爲會元以前，先已有考官向他推荐福建建甌縣人一卷。裕德也認爲那本卷子不錯，他已決定了以此取爲會元。可是當張百熙跟他一情商，裕德的官階雖然高過張百熙，可是張百熙却比他先進翰林院，科場繁重輩份，裕德在私底下還是得尊稱張百熙一聲老前輩，因此他唯有欣然應允。另一方面，則張百熙倘若不是有此

把握，他也決不會作此一請了。

等到張百熙跟裕德對調的那一份福建閩縣試卷一拆開彌封，衆考官一看那揭了曉的姓名，竟會情不自禁的齊齊喫了一驚，——這真是此人命中註定，大清帝國的氣數已盡，連手到擒來的一朝代間三度連中三元之吉兆，都跟煮熟的鴨子般又給飛了。因爲那一卷是福建閩縣優廩生，年方二十六歲的林志烜的，衆考官都知道：林志烜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的解元。

這一取捨之間，關鍵實在太重大了。如果不是張百熙爲彌補湖南人的缺憾，也得個末科會元，那麼，已經中了解元的林志烜，連戰連捷，再度中了會元以後，他進京殿試，在慈禧七十大壽，因而舉行恩正併科的情況下。八位殿試的閱卷大臣，鐵定的會把林志烜取在前十名之列，而慈禧最後決定名次時，更毫無問題的將俯允衆主考之請，以林志烜爲狀元了。末科科舉出了個連中三元的林志烜，對清廷和慈禧來說，將是何等的光采。那「重治熙治」的歌頌，豈不是又要轟動九城，瀰漫全國，爲滿清皇室注射一針興奮劑嗎？

榮任湖南諮議局長

慈禧壽辰，遜清末造，終未能出現三度連中三元的盛事，相反的，却正好給譚延闓作了最好的宣傳，使他的大名傳播久遠，幾於無人無知，無人不曉。會試以後緊接着便是殿試，譚延闓高高的得了二甲第三十五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翌年，他父親譚鍾麟病逝，清廷予諡文勤，賜祭葬，譚延闓報了丁憂，自此他不在滿清朝廷做官。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譚延闓年方三十一歲，他便榮任湖南省首任諮議局局長，三湘名流耆宿，對他一致欽重，衷心擁戴，這一份榮譽之獲致，確實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譚延闓就任湖南省諮議局局長後的第一件

大事，就和曾經歷任督撫三十年，同治、光緒、三朝最獲清廷信任的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督辦粵漢鐵路大臣張之洞正面交鋒，鬥上一鬥。由於張之洞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初任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時，曾以兩湖物力艱難，集款不易，鐵路永遠無法築成，所以他為清廷釐訂了大舉外債築路的決策。為三湘紳士商民大為不滿，當時羣情憤激，一致堅決表示，寧願集款自辦，也決不籌借外債。譚延闓方始接長湖南諮議局，他便提出議案，議決了湘境鐵路年限趕修辦法，計為下列四項：

- 一、毋庸借債，速將草約註銷，以斷葛藤。
 - 二、實行商辦，以堅股東信用。
 - 三、應由公司任用鐵道學生，改良內部組織。
 - 四、多培養鐵道人才，俾為桑梓盡義務，同時也可以節省薪資。
- 除此以外，他又使湖南諮議局通過了下列十條行之有效的籌款辦法：
- 一、累進租復法。
 - 二、鹽斤加覆錢價。
 - 三、開設鐵路銀行。
 - 四、分區勸股。
 - 五、在外集股。
 - 六、就事擬勸之股。
 - 七、各界以薪資入股。
 - 八、官缺股。

九、發行鐵道債票。
十、各地方公儲股。

然後再附以詳盡的取銷外債，自行築路計劃，茲誌其大要如下：

- 一、限定築路期限。
- 二、自籌築路費用。
- 三、築路後作為營利事業。
- 四、綜覈實需款項。
- 五、嚴格統計出入。
- 六、妥為追加豫畫。

掀起辛亥革命怒潮

值得注意的是，如所週知，宣統三年係因鐵路收歸國有，使清廷觸發了川、鄂、湘、粵四省民衆的憤慨，怒潮一發，不可遏止，方始在華中、西南一帶掀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焰。四省同胞不甘認股投資，興築鐵路的血本，被清廷巧取豪奪，一舉沒收。由而激發了「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的心理，敲響了大清帝國的喪鐘，加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之建立。由此看來，宣統元年譚延闓就任湖南省諮議局局長後，以他登高一呼的力拒外債，限年集股從速築路，不僅是對清廷和張之洞的當頭棒喝，尤且推動了兩年餘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的壯闊巨大波瀾。

當時的湖南巡撫是岑春煊之兄岑春煊，他被諮議局長譚延闓一再催促，速將湖南諮議局所議決的湘人自行

築路辦法、籌款辦法暨計劃奏報清廷，有以阻止清廷再照張之洞的擬議大舉外債，引入洋人的勢力入侵三湘。可是，岑文煊却認爲自己的紗帽要緊，他一拖再拖，直到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張之洞病卒，他方始於同年十一月十四日（陽曆十二月二十六日），將湖南諮議局的議決案不加按語，逕予轉奏。果然，電奏上去便成了石沉大海，杳無下文。因此，從宣統元年到宣統三年（一九一〇—一九一〇），譚延闓都在爲拒借外債，力主湘人自築湘境鐵路而奔走呼號，奮鬥努力。由於他的極力主張，湖南在清廷允准湘人自築鐵路以前，便設局辦事，募集股款，他決心用事實表現，阻止國家的利權外溢。

譚延闓盡心擊畫，多方努力，直到宣統三年（一九一〇）三月十四日，清廷鑒於湘鄂粵三省設局募股已成事實，即令大力阻止，爲時已是不及。同時清廷更垂涎三省民衆盡出血汗錢聚集的鉅額股款，方始在三月十四日下了一道語意含混的詔旨：

「……據申奏：『湘境鐵路，湘人力能自辦，無須借款，據紳商人等環請陳奏，請飭部設法維持』等語，著郵傳部知道。」

充其量，這祇不過對湘省既定決議，已成之局，作了個備案的表示而已。但是，抗爭經年，呼籲多時的湘人自築鐵路，力拒借入外債，總算有了個聊勝於無的結果。譚延闓和三湘民衆是欣慰已極，他們更積極的籌募股款，從事築路。然而，不旋踵間，霹靂一聲，羅掘俱空的清廷，「一則垂涎於海外之華商，一則注重國內之財主」，窮極無聊的猙獰面目居然出現。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陽曆五月九日），昭示鐵路國有論下，其間還惡意中傷，推卸罪責的說：

「……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鉅，參追無着。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膏脂，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恐曠日持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

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卽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銷。……該管大臣毋得依違瞻顧，一誤再誤。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卽照違制論！」

這便是中國曠古以來從所未有的皇帝放槍，朝廷打劫，將四省（連同四川）的萬民膏脂，湊集股本，一古腦兒擱奪過去。直使四省商民呼搶天地，惶惶無計，憤怒的情緒助長了大革命的烈焰，汹汹的民情一發不可遏止。繼川路風潮，成都血案，而後辛亥起義，革命軍興，湖南省垣遂卽響應，焦達峯、陳作新攘臂而起，長沙乃在一日之間盡復漢官威儀，飄揚革命軍旗。祇是，很不幸的，在大動亂中難免會有流血事件發生，焦達峯、陳作新兩督先後爲亂兵所戕，省垣革命軍羣龍無首，湖南各地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更嚇人的消息是清軍乘勢來犯，前鋒已經迫進武勝關，就在這危疑震撼，三湘民命繫於一髮的空前嚴重關頭，三湘各界一致提出了力請譚延闓撥亂反正，主持大計的擬議。譚延闓便在這萬民囑望聲中出任軍政部長、湖南都督兼省長，同時也展開了他一生中嶄新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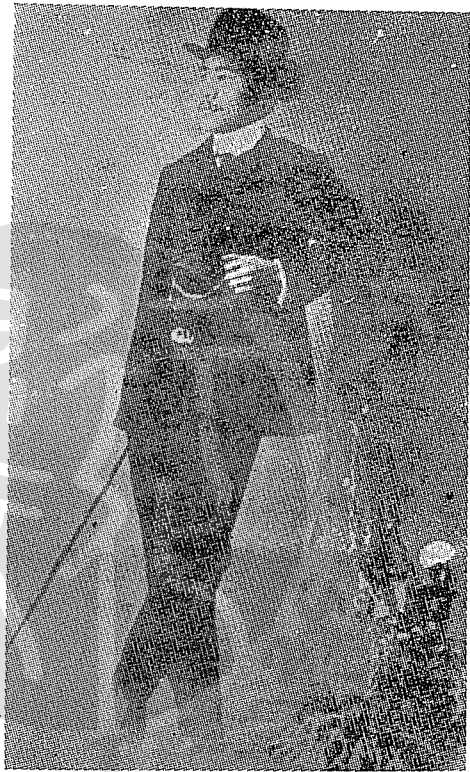
瀏陽二傑有「譚唐」

辛亥武昌起義，革命同志強挽黎元洪出任鄂軍都督，旋即召集革命黨代表會議，當時黎元洪猶圖效忠清廷，竭力「轉圜」。他曾在會議席上質問革命同志：

「假使瑞澂（湖廣總督）、張彪（新軍第八鎮統制）向朝廷請兵，水陸並進，諸君又將如何區處？本人出身海軍，深知海軍艦砲的厲害，到那時候，請問諸君能够退避到何處去？」

革命同志鄧玉麟立刻抗聲答道：

譚延闓通而有則



就，鵬大焦督都任一第南湖
。戕所兵亂被後日十職

「就算軍事失利，我們也可以退守湖南。」

黎元洪於是再問：

「湖南有何把握？」

鄧玉麟不惜洩漏機

密的說：

「焦達峯已經和我

們約定，下月初在湖南

舉事。」

這是辛亥革命成功很重要的一个關鍵，因為黎元洪還在一心想當清廷的忠狗，他的左右尤有不少陰謀破壞革命的官弁。自黎元洪被革命同志所脅出任都督後，他一直都在設法和清廷清吏通消息，其間還遭革命同志接連揭穿破獲了幾次。倘使黎元洪的陰謀萬一得逞，那麼，在武昌首義十天後的長沙起義極可能被清廷獲悉，長沙方面的黨人勢將為清吏一網打盡。舉事受阻，湘中發不出援軍支撐武漢危局，武漢三鎮革命軍處境之險惡不難想像，說不定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武昌起義」，又將步黃花崗之役的後塵。

辛亥九月初一（一九一一年陽曆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的長沙起義對於革命全局，乃至中華民國的建立實在是在太重要了。除却一壯武漢革命軍聲勢，出兵支援武漢前線之外，由於三湘地理情勢衝要，自湖南首先響

應武昌義師以後，西南各省，無形中已與北方切斷聯絡，華南、華北的清軍全部隔絕，首尾不能兼顧，陷於各自為戰。因此，廣東、廣西的清吏一看大勢已去，不得不放棄抗拒革命起義的意圖。兩省都在兵不血刃，七零八落的情況之下宣告光復。

焦達峯名大鵬，字達峯，號鞠孫，湖南瀏陽人氏，自小便睥睨一切，豪邁不羈，卓犖有大志。他十四歲進瀏陽高等小學，時在三湘維新巨擘譚嗣同，正氣會首唐才常，這「瀏陽二傑」壯烈捐軀之後，瀏陽人津津樂道譚嗣同與唐才常二氏，尊之為「二傑」，引為瀏陽人的莫大光榮。高等小學堂的學生們，更以譚唐為崇拜的偶像，經常把譚唐二傑掛在嘴上，內中唯獨目空四海，氣吞牛斗的焦大鵬不以為然。他一聽同學之間悼念譚唐談論譚唐，他便怒目奮張，拍案而起，慷慨激昂的說道：

「譚唐早已死了，後起的譚唐還多着呢。看那般滿奴，能够殺光我們堂堂男子漢嗎？」

焦大鵬原本就長得體格魁梧，英氣逼人，當他慨乎言之的時候，益發的目光炯炯，雄姿英發。因此，同學們便給他取了個綽號叫「譚唐」，又戲稱他俾士麥，納爾遜，他一概受之不辭。

這位從小便立志為革命前驅，英雄人物的焦大鵬，十八歲赴長沙，入高等普通學堂游學（留學）預備科，和湖南革命先烈禹之謨結為好友，許為同志，在長沙宣傳革命甚力。二十歲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進東斌學校，他担任過同盟會聯絡部的調查部長，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九月，同盟會附設的共進會組織實行革命機關，預先推舉各省都督，湖南都督一席，便推由焦大鵬担任。這也是辛亥九月初一長沙首義功成，焦大鵬膺選湖南首任都督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由戊申那年，同盟會附設共進會的那一次選舉以後，被推定的各省都督人選，旋即分別返國，籌劃起義。焦大鵬係於戊申十二月，從日本抵漢口，和湖北方面的革命同志議定方略。也就在這個時候，湘鄂兩省的革

命志士，開始齊一步驟，協同動作。彼此互作支援，聲勢不然一壯。

長沙舉義倉卒而起

焦大鵬對於湖北方面的革命工作，也有直接的貢獻。那是在宣統三年己酉（一九〇九）三月，他自湖南再赴武漢，和湖北同志組織總機關於漢口，分機關於武昌。那時候因為革命經費無着，一切工作無法展開。焦大鵬却在武漢遇見兩位販賣夏布的瀏陽同鄉，周海文和劉肯堂，他說服了他們兩人加入同盟會，周海文和劉肯堂便將他們所攜去的夏布盡數脫售，得來的款項，用之於分配各革命機關，武漢的革命機關賴以正式建立。這年七月，焦大鵬和周、劉兩同志同長沙，他自己改了個名字叫左耀國，四出運動瀏陽、醴陵、萍鄉等地的會黨，然後再回長沙組織機關部，派遣同志四出聯絡黨人。到了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光祇是萍鄉、醴陵一帶，他已經編組了一千餘位同志，隨時準備舉事。辛亥那年二月，譚人鳳、李鳳、李鳳、李鳳等會香港統籌部之命，由漢入湘，就會和焦大鵬約定，三月間廣州起義，由焦大鵬在湖南響應。

二月後，焦大鵬又一度北上武漢，協助武漢方面的同志響應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其間由於革命經費短絀，曾經演出赴蕪黃盜金菩薩的一幕，焦大鵬也是主角之一。盜金菩薩不成，而三二九黃花崗告敗的消息不旋踵傳來，革命大業受到重大的挫折，可是華中一帶的同志却並未氣餒。不久，由湖南諮議局局長譚延闓主持的力爭鐵路國有一案事起，焦大鵬認為那是很好的舉事機會，他聞訊立即返回長沙，密謀舉事而卒未果。於是在五月間組織長沙體育社，作為發動起義的祕密機關，然而再與二十九混成協四十九標排長兼教官，因宣傳革命而被迫離營的另一位瀏陽革命志士陳作新，竭盡全力運動新軍暨巡防各營。到了辛亥之秋，各處的部署均已就緒。

辛亥八月十九（十月十日）武昌首義，照焦大鵬、陳作新的原訂計劃，是想在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起而響應。但是很不幸的，時任湖南巡撫的余誠格，和防營統領黃忠浩已經聽到了風聲，屆期防範極為嚴密，焦陳二氏的舉事計劃唯有臨時取銷。可是當時武漢革命軍孤立待援，其他各省起義又遲遲不克實現，革命情勢危殆萬分。黃忠浩又在調集長沙省垣以外的各巡防營，亟於進擊據守武漢的革命軍，焦大鵬眼見時機緊迫，聞不容髮，他便召集同志憤然的說：

「中華民國之存亡絕續，在此一舉。此時此際，我們革命同志唯有生死以之，沒有什麼可猶疑的！」

湘中同志聞言無不心胸一壯，血脈憤張。於是，九月初一（十月二十二日）凌晨，當革命同志砲隊代表李金山獲悉黃忠浩將於是日調遣砲隊開往醴陵的消息，他立刻奔至步隊第四十九標，緊急知會步四十九標的代表安定超。安定超認為如不從速舉事，先發制人，革命力量一旦分散，那就很難再度起義發難。因此，他斷然作了決定，告訴李金山說：

「你趕緊回營邀集同志，從速準備。聽我們這邊槍聲一響，立刻發動。」

等李金山一走，安定超馬上就奔向操場，吹起緊急集合口哨來。砲隊的弁目（士官）兵丁大都是革命同志，聞聲迅速集結，然後同時朝天連開三槍。轟然槍聲，驚動了工程隊的代表譚滿芳，然後便是步隊四十九標、五十標、馬隊、輜重隊聽到槍聲紛紛發難，一致策應。新軍同志分兵兩路猛撲長沙北門和小吳門。四十九標二營後隊（連）代表彭友勝率領全隊弟兄穿越協（旅）部大操場，跑到五十標營盤門口，高聲大叫：

「我們去攻北門，你們快一點來呀！」

五十標的代表鄧超、張建良等聞聲立刻率領全標的革命同志跟蹤前進。在五十標同志之後陸續加入的，還有馬隊與輜重隊。

譚延闓任參議院長

負責守北門的是巡防營管帶趙春霆，他那一營的官兵，早已被革命同志聯絡成熟，因此當浩浩蕩蕩的革命同志大隊開到北門，北門守軍一致列隊舉槍致敬。革命軍順利進入北門後，分兵一部在北門扼守，其餘同志飛奔前往軍裝庫，由守庫的巡防第八隊同志接應，打開庫門取出子彈，增厚革命軍的作戰力量。

但是進攻小吳門一路的革命軍却受到了阻力，守城的巡防營清兵一見革命軍臨近，立刻就在城上散開舉槍射擊，而且城門也緊閉未開，使安定超所率領的四十九標二營三隊（三個連）、譚滿芳等所率之工程營兩隊、李金山等所率之砲兵營一概受阻於小吳門前，無法推進。砲兵營的同志急於進攻，開始拖出大砲來，砲口朝向城上瞄準。——但是城上巡防營的清軍早就知道，砲標所貯存的砲彈和砲膛口徑不合，根本就上不了膛，遑論發射？因此了無所懼。雙方正相持不下，大革命時期的一項奇跡出現了，有一位革命同志工兵營代表賴楚，他在頭一天晚上因事進城，九月初一凌晨在城裏聽到槍聲，正想出小吳門回營，他到達小吳門時，發現城門附近無人，小吳門雖然緊閉，却是不曾加鎖，這真是天賜良機。賴楚因而被激發了無限勇氣，他奮身向前，一伸雙臂振落了巨大的城門槓，就此大開城門讓革命同志一湧而入。至此，新軍同志全部入城，革命旗幟也開始飄揚於旭光萬丈之中。

聲勢浩大，氣壯如山的革命軍一旦入城，湖南巡撫余誠恪心知大勢已去，他倉皇出走，逃匿無蹤。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則騎馬帶隊逕出巡撫衙門，轉往又一村，他在途中被革命同志逮住，黃忠浩不但拒絕投誠，尚且表示自願一死以報宣統兒皇帝的「龍恩」，他要求不易清服，向北謝恩而後死。革命同志唯恐他倖而逃生必定會調集防營來攻，只好將他殺了。事後，當軍政府成立，還特地爲他出了如下的一個告示：

「軍政府示，爲出示曉諭事，查黃君忠浩本我湘豪傑之士，原應請其同襄義舉，無如以軍事上之計劃而論，遂至不能不然，此本都督所深悼惜，凡我同人皆當鑒諒。現已飭令厚殮，一切皆爲料理，以表愛敬豪傑之心，合即逕行曉諭，一體知悉，切切此諭。」

即此一端，可知革命軍之爲仁師義舉。

革命同志在一片紛亂之中，從容不迫的理出頭緒，於光復長沙全城以後，一面拍電報調集前此開往各地之新軍，一律尅日回省。一面邀集革命代表，省垣士紳，乃至警界、商界人士，假譚延闓爲議長的湖南諮議局舉行會議，商討如何組織軍政府，並且選舉都督。

這一次緊急會議由革命同志文斐擔任臨時主席，他在報告此次長沙起義經過以後說：

「焦君達峯，奉同盟會本部特派來湘主持軍事，響應武漢，厥功甚偉，因此吾人應推焦君達峯爲都督。」與會人士一致歡呼鼓掌，表示擁護，於是，文斐再作建議：

「陳君作新原係步隊官長，兼特別學校教員，素抱革命主義，因授課語涉排滿而遭清吏撤職。陳君於起義之前輔助焦君聯絡軍隊，光復之功當爲第二，因此吾人應推陳君爲副都督。」

與會人士又復熱烈表示贊成，湖南首任都督、副都督的人選至此宣告決定。不過焦大鵬（達峯）、陳作新謙冲自持，相繼表示力辭。因此，當日會議又決定成立湖南軍政府參議院，負責規劃軍民兩政行政用人一切事宜，藉而產生制衡作用，成爲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民意機關。並且推定遜清湖南諮議局局長譚延闓爲首任參議院院長，三湘名流耆彥粟載時、劉衡、文斐、洪榮圻、易宗羲、左學謙、廖名縉、曹耀才、曾傑、黃鏜、黃翼球、閻鴻禔、吳作霖、文經偉、潘昭、李德羣、余昭常、李九、黎錫圭、楊兆鵬、譚心休、常治、黃昌清、李治、劉勁、鄭寅亮、危道豐、蔣國經、黎作學二十九人爲參議員。

儼然而為太上都督

由譚延闓所主持的湖南軍政府參議院，權力相當的大，職責異常之重，幾於駕乎民國成立以後的一切民意機關之上。根據該會規則：都督府之命令，「必經」該院決定，加蓋戳印，再請都督蓋用印信，復由該院發交各部執行。假如雙方意見不一致，則由都督說明理由，提請該院覆議。如果覆議再予否決，都督便連提請再議的權利也沒有了。相反的，當參議院任何一位議員，認為有急需辦理的事項，都可以主動的提出議案，由參議院議決以後請都督認可蓋章，並由參議院發交各部付諸實施。倘使都督對這一議案不表同意，尙且需要說明理由交參議院再議，再議時只要得到參議院參議員半數以上到會議決，仍舊認為可行時，都督就不得加以拒絕。

軍政府參議院規則規定：參議員無定額，任期也暫時不作規定，同時，參議院須增加議員時，得由參議院認可。更其重要的是：參議員的會議得隨時舉行，而且只要十位參議員到會，就可以開會議事，尤其祇需十位參議員的過半數通過，即可決定一切軍政大計。而這一項參議院規則的增刪修改，却非得全體參議員的過半數通過始為可。由此可知，就湖南軍政府而言，軍政府所屬的參議院是絕對的高高在上，大權在握，其院長譚延闓，實可以稱之為太上都督。

湖南光復以後，賴譚延闓所表現的遠大目光，雄才大略，確曾使湖南成為中華民國艱難締造的一支奮戰主力。焦大鵬和陳作新在長沙光復，湖中底定以後，部署稍定，就亟於領軍北上，支援武漢。而當時武漢三鎮革命軍的情勢亦至為危急，武昌起義後二日（陰曆八月二十一，陽曆十月十二日），清廷即將倉皇而逃的湖廣總督瑞澂革職，命渠戴罪立功，尅期恢復。這時候新軍第八鎮（師）統制張彪還帶出一支殘軍駐守漢口劉家廟，清軍的長江水師已在程允和的統率之下迅速向武漢推進，清廷猶在督飭海軍加派兵艦，由薩鎮冰統帶赴鄂應援



湖首南副都督陳作新和他，焦大鳴同時遇害。

。八月二十三日（十月十四日

）北洋新軍領袖袁世凱又復被清廷起用，任爲湖廣總督，負責節制各路援軍暨鄂省原有部隊。革命軍方面則倉卒成軍，指揮不一，徒憑大無畏的勇氣與強大清軍抗衡，就實力分析彷彿必敗無疑。所以湖南的就近馳援無異一帖強心劑，足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九月初一

（十月二十二日）長沙光復後

新組成的湖南軍政府，第一件事便是和武昌方面切取聯絡，由於湖南革命軍缺乏槍械彈藥，武漢三鎮急需大軍糧糈，湖南湖北迅即互通有無，彼此接濟。而湖南在接獲武昌軍政府所運到的快鎗銀幣之際，馬上就派王隆中一協（旅）北上武漢作戰。當時清軍第一軍統（軍長）馮國璋所部一萬餘人已經開到漢口，第二軍統段祺瑞部還在源源而來，這都是袁世凱北洋軍的精銳。湖南王隆中一協趕到方始抵住了北洋軍凌厲的攻勢，湖北、湖南的革命軍並肩禦敵，經由七日夜的浴血肉搏，始克保住武漢三鎮這一處革命軍立足點。

當湖南軍政府悉調新軍大舉援鄂，正是長沙城裏滿清忠狗，舊派人物密謀反動，伺機待變之際。反革命份

子在三湘各地還有很大的潛伏勢力。這一點焦大鵬、陳作新、譚延闓等並非毫無所知，例如焦大鵬即已抱定必死之決心，不顧危機之隨時可能來臨，他曾告誡他的部下們說：

「今日大局未定，一般滿奴，必欲取銷獨立，爲他們的主子效愚忠，因此他們必欲殺我。但是我亦誓死不去，以待各省的紛起響應，如今我可以斷言將來殺我的必定是滿奴，而非百姓，因此萬一我不幸遇害，諸君絕對不可遂行報復，殃及無辜。」

那時候諷知長沙可能有變的革命份子頗不在少，所以大家勸焦大鵬留一部份新軍在長沙，預爲防範。可是焦大鵬認爲救兵如救火，在清軍大舉反撲聲中，萬一武漢有失，辛亥起義或將「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因此他傾力赴援，悉軍北上，終於給了舊黨可趁之機。長沙光復後十日，舊黨故意在長沙城外掀起紙幣擠兌風潮，焦大鵬命陳作新馳往鎮壓，一出城便有伏兵四起，槍彈橫飛。叛兵揚言爲黃忠浩復仇，於是陳作新首先罹難，焦大鵬相繼被戕，三湘陷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二督被戕主政三湘

當時三湘亂事嚴重，革命大勢岌岌可危，長沙有亂黨叛兵盤踞，而大隊清軍又已迫近湘北門戶武勝關。便在這一髮千鈞，危疑震撼的危急關頭，譚延闓以閩閩子弟，少年進士被革命同志擁而出任軍政府軍政部長，旋即改任湖南第二任都督。一方面由於譚氏個人的聲望，另一方面也以他的魄力雄渾，處斷明快所使然。他居然能撥亂反正，置內憂外患交相侵逼的三湘於磐石之安。這實在是很了不起的一項奇迹，由而充份證明了胡漢民對譚延闓的衷心讚佩之詞：

「……而其精到練達，更非普通人所能企及。……譚先生雖然和平，但在緊要關頭，却又大節凜然，從沒

有絲毫苟且。」

這位名宦後裔，遜清進士，在舊黨死灰復燃，幾於將軍政府一舉推翻，而強大清軍又在壓境而來的重大關鍵，他所表現的態度是革命到底，決不妥協。他先施鐵腕，壓制舊黨，迫使作亂叛兵作鳥獸散，使省垣長沙的秩序恢復安定。然後，他便開始正視整個革命情勢的發展。在譚延闓就任湖南第二任都督的那一段時期，他的種種表現，可以說具有大政治家，大軍事家的氣魄與風度。他從大處着眼，以國民革命的全面成功，專制政治之整個推翻爲念。當黃興衆寡不敵，在漢陽前線苦戰失利，清軍正着着進逼，辛亥革命瀕臨失敗邊緣，譚延闓却以傑出戰略家的姿態，續派甘興典率領在長沙新編的第七、第九兩標（兩個團）夏占魁的一個營，和劉玉堂的巡防隊第二營星夜馳援。這三支革命勁旅歸於黃興的指揮系統之下，無不奮勇爭先，以一敵百，發揮了三湘健兒慷慨義烈的精神。湖南援軍前後在漢口，漢陽鏖戰十餘晝夜，前仆後繼，視死如歸，傷亡人數達一千餘名。其中尤以巡防隊第二營管帶（營長）劉玉堂突入敵陣，奪取猛烈掃射的機關槍當場陣亡，更是開國革命史上，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一章。

除了續派援兵，支援武漢前線，譚延闓又別遣一支革命軍從湖南萍鄉進入江西，趨南昌，襲九江，斷絕清軍長江水師和薩鎮冰的歸路。同時他認爲荆襄據武漢上游，係湘蜀門戶，軍事計劃，在所必爭。因此他又派統領王正雅仰攻荆襄，確立堅強的革命據點，並且和江西一路遙相呼應，減輕武昌方面的清軍壓力。

遣一支軍，立取荆襄

譚延闓派遣三湘革命軍奪取荆襄，是罕少被人提及的開國之初非常重要的一戰。王正雅所部在十月初六（十一月二十六日）進抵沙市附近的草市，清軍大舉來迎，雙方遂在草市展開激戰。革命軍擊斃了清軍的一名帶

隊官，和數十名清軍，傷其一百數十名之多。但是革命軍本身並無喪亡，祇有數人受傷。他們還鹵獲清軍一具繡龍黃綾鐵甲，得了好幾十桿槍。就在這個時候，湖北革命軍也一鼓作氣攻克襄陽。

從而湘鄂兩省的革命軍又度併肩作戰，十月十三（十二月三日）午後六時，王正雅所率的湘軍會同鄂軍宜昌軍司令唐繼文，合攻荊州。由唐繼文攻東門北門，王正雅向西門南門猛撲。城上清軍放大砲，疾若流星，彈下如雨，砲彈呼嘯着從革命軍的頭頂心上飛過。革命軍則奮勇前進，架起雲梯攻城。

由於荊州西門、南門的地勢較低，湘軍仰攻不易，所以從薄暮攻到深夜，猶仍急切難下。其間王正雅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尚且被槍彈擊傷了腿部，但他却裹傷再戰，誓死不退。荊州攻防戰整整持續了十五個小時，直到十月十四日（十二月四日）上午七時，方始將荊州攻克。清兵死者一百數十名，受傷三百餘衆。湘鄂聯軍攻陷這座名城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那是一場性命相搏的硬仗。荊州向爲清廷控制西南的最大軍事據點，城垣堅固，防衛嚴密，在城裏設有荊州將軍（清制高於總督的統兵官），城裏的八旗兵及其眷屬尤有兩萬餘人之多。這一萬多旗人誤以爲革命軍一到，他們必定性命難保，因此他們是不惜拚鬥到底，在作殊死戰的。

九月十四荊州城陷，都統銜齡自戕，襄陽道喜源全家自盡，其餘清吏清兵由佐領率領向湘軍統領王正雅乞降，湘軍連鹵獲外帶清軍繳械，得了一千餘桿槍，然後王統領和唐司令分自東、北二門入城。荊州將軍署放砲歡迎，磕頭求活，並將荊州城裏的槍支器械，一應公物全部呈獻，這真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以來極其重大輝煌的一次勝利。

譚延闓在長沙接獲捷報，至爲欣慰，他曾致電上海民立報館，轉告各方。不久，統領王正雅又有急電拍來，陳報清廷的荊州將軍聯魁親齎印信呈繳，哭求王統領准許旗人暫時留駐荊州，他說駐在荊州的旗人生計窘迫已達極點，要求准發恩餉，或給出境謀生護照，或准租佃原有的公田。荊襄沙市一帶的居民，都懇請軍紀嚴明

，秋毫無犯的湘軍留在荊州莫走。譚延闓當時所作的決定，即以「急須推仁，以重人道」爲前提，他電示王統領遵照下列的四項原則辦理：

- 一、旗人全無財產而係赤貧者，每戶酌予發給謀生費若干。
- 二、凡有財產者，除發給必要生計費用外，其餘財產均歸民軍保護。
- 三、凡是需要護送出境者，由民軍指定地點，加以分散安置。
- 四、准其隨地佃田耕種，不必指定公田。

至於當地民衆要求王統領所部留在荊州的問題，譚延闓指示他應該會同安襄荊鄖招討使，妥商辦理。也就是說他願尊重鄂軍方面的意見。

大有功於全國革命

譚延闓在驚濤駭浪，形勢緊迫之中接任湖南都督，他最卓越的成就猶在促進廣西兵不血刃而告光復，使清廷與西南全部隔絕，革命情勢因而更趨有利。湖南光復對於武昌起義的重要性已如上述，廣西獨立更使湘鄂兩省堅強屹立，進而敲響了大清帝國的喪鐘。譚延闓在就任湖南都督以後，曾函電交馳，力促廣西諮議局發動廣西獨立之舉，函電中反覆的曉以大義，喻以大勢。九月十六日（十一月六日）廣西諮議局終於議決廣西全省脫離清廷宣告獨立了，當時的廣西巡撫猶未遽允，可是藩司王芝祥却表示贊成，而廣西省垣桂林的新舊各軍，又都抓在王芝祥的手裏。於是王芝祥乃於十六日深夜，從藩司衙門發出大批獨立旗幟，乘夜闌人靜的時候擲入各家各戶。第二天一大早上，家家戶戶都懸出了上書：「大漢廣西全省國民軍，恭請沈都督（按指廣西巡撫沈秉堃）宣布廣西獨立，廣西國民萬歲！」的大旗。沈秉堃迫於無奈，祇好和藩司王芝祥，巡防營統領陸榮廷聯名

致電梧州關道，照會英國領事，表示廣西軍政府成立後將力任保護洋人之責，廣西獨立乃告順利完成。

廣西光復以後，譚延闓旋即推舉廣西都督沈秉堃出任湘桂司令官，力促廣西出兵，和湘軍一齊北上支援武漢。這個計劃也被他從容達成了，湘桂聯軍迅速組成，由湖南省境出金口（在武昌縣以南六十里處），趨武昌。這時候雲南、廣東、貴州、江西、福建西南各省均已先後光復，所以在譚延闓的「大漢民國各省會師北伐檄」中，曾經有過：「雲南一呼而六省應，廣西一舉而半壁傾」的壯語。辛亥十月初九（十一月二十九日），湖南都督譚延闓又曾爲全盤戰略問題致電鄂軍政府，提出他的主張，這是一份很重要的革命文獻，足可顯示當年譚延闓的高瞻遠矚，胸中韜略：

「迭電均悉，鄂湘一家，安危同繫。現在桂軍已於（十月）初七（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永州出發，兼程赴敵。敵處已商請廣州胡都督（漢民）、福州孫都督（道仁）、整頓海軍，連合吳淞軍艦，直攻天津（按上海時亦光復），以擊敵兵之尾。並請孫都督揀派精兵，由海道來援。又電請貴州楊都督（藎臣），出兵銅仁，與我軍會合，取荆襄、出沙洋（沙市，和枝江東南十五里的洋溪舖，北臨長江，有小火輪下達沙市上通宜昌），以擊敵兵之腰。更請桂林沈（秉堃）、王（芝祥）都督、南寧陸都督（榮廷），加派老練之兵，與敝省會師，起期赴援。尚望堅守武昌，以圖合勦，決不稍存畛域，貽誤中華大局。辛亥十月初七日。」

鄂軍都督黎元洪收到了譚延闓的這個電報，亦曾覆電力催，原電如次：

「陽電悉，碩畫極佩，仍望電催各軍，火速分途進行。……」

譚延闓的原電一字不改，全部照錄，括弧中則係筆者的小註。由這一封電報，可以證明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以後，當清軍大舉南下，力圖掙扎。武昌革命陽夏失陷，困守武昌危城的那一段艱難危險時期，就唯有譚延闓坐鎮長沙，擔當艱鉅，出兵支援陽夏之戰，取荆襄、入江西，力促廣西舉義，電請各省援鄂，還要竭力的給

黎元洪鼓勵，打氣，釐訂全盤戰略，遂行直搗幽燕的壯志雄心。在中華民國艱難締造之初，長沙實遠比武昌益形重要，更能發揮巨大的革命力量。因為她不但是全國援鄂的聯絡中心，尤且成爲支援武昌前線最力的後方重鎮。彭楚珩著：「湖南光復運動始末記」曾有言謂：

「湖南處長江南岸各省之中樞，洞庭控其北，五嶺障其南，東接豫章，西通川黔，與鄂贛如輔車相依，與粵黔則如咽喉相扼，形勢險要，物產豐饒。古之圖天下於江南者，未有不先圖湖南。故湖南首先響應武漢，使黨軍無後顧之憂，粵桂受隔絕之困，豫章黔中，亦同受威脅，使各省同志得以紛起響應。其意義之重大，實不僅使湖南一省脫離專制領域，且大有功於全國革命也。」

這一番話，不失爲公允之的平。

北伐檄文擲地有聲

譚延闓在辛亥武昌起義以後，並沒有親身參與革命組織，但是他却具有極強烈的革命思想。這可以從他就任湖南都督，所發佈的「大漢民國各省會師北伐檄」中很明顯的看得出來。譚延闓在這篇檄文裏直斥滿清爲「曼珠野部，金源遺種，墮遼河以自固，併葉赫以稱雄。值朱明之晚年，更窺上國，因吳藩（按指吳三桂）之失策，便盜神臬。自東西以迄北南，汚神輿四萬餘里，由甲申至於庚戌，閩國統二百餘年。其始犯邊，甚於流氓，迨後入關，更無人理！」他尤指出滿清奴役漢人的事實，大見一針見血，痛快淋漓之致。例如他說滿人「自爲帝制，盜憎主人，鉗制千重，侵陵百出。」「雜髮令下，漢家瓜蔓之抄，文字獄興，唐代清流之禍。」於婚制示主奴之意，於兵制見猜忌之心，官爵有壟斷之形，賦稅有偏枯之病，刑法乃普通之法，設輕典以待宗盟，制科乃桎梏之科，開別徑以通旗籍。「然後，再痛予呵責——

「類此者，成何國政？」

這一篇義正嚴詞，擲地有聲的「北伐檄」；論文字，非大手筆莫辦。言氣勢，尤爲深明民族大義，具有革命思想的豪傑志士方始可以寫得出來的。由而可知譚延闓久已有排滿滌腥，「還漢至於舊都，建中朝爲民國」的志向與抱負。所以他才會始終站在革命黨人的這一邊，明裏暗中，處處出力，絲毫不以己身的安危爲顧。早在長沙起義之前，由於漢口革命機關遭受清吏破壞，搜出大批黨員名冊，鄂湘二地清吏風聲鶴唳，如臨大敵。鄂督瑞澂和湖南巡撫余誠格同時採取行動。余誠格尤且偵獲長沙賈太傅祠是革命黨的機關，當時就有湘中舊派耆紳蕭榮爵、楊鞏等人，暗地裏請湖南巡警道和長沙知事沈瀛趁此機會羅致黨獄。余誠格都獲得了一份長沙城裏城外的革命同志名單，正打算按名逮捕。事先他拿那張名單給譚延闓看，時值譚延闓方自北京爭路歸來。他一看那份名單便故做輕鬆坦然，漫應了一句詭言：

「這些人都是酒色之徒，何懼之有？」

就由於他爲了解救黨人迫不得已撒了個謊，余誠格方始不會將事態擴大，逮捕黨人之舉也因而中止，這才九月初一長沙起義的卒告成功。

譚延闓在民國肇造之際並非革命黨員，但是他的革命立場最堅定，革命行動最積極，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也至爲重大。同時，在他担任湖南都督以前，譚延闓並無實際領軍從政的經驗，可是事到臨頭，他的表現偏又異乎尋常的當行出色，處處顯示他能統籌全局，任重負遠。例如，他曾以嚴正的態度通電全國，揭諸民國的宗旨在於共和，「獨立」二字之乖於名實。他這一份致各省都督及各軍政分府的通電，不但可使我們從而規知他的政治抱負，尤且說明了他的目光是何等遠大。這一份珍貴的文獻，全文如次：

「各省都督及各軍政分府鑒：此次各省起義，宣佈獨立，係對滿廷而言，非各自爲謀也！現在大江南北，

悉就範圍，海軍抒誠，已得全數。民國宗旨，同主共和，則曰『獨立』二字，尤乖名實。不獨中山（按指國父孫中山先生）來電，外人疑難，或因此團結未堅，內則分裂以省界，外則相侵以列強，殊非新中華民國所宜。同是炎黃子孫，斷不能稍有畛域。前蘇州程都督（德全）全國聯合會議，湘省已極贊成。惟現在北虜未滅，亟待攻討，除軍事進行，應由各省聯合計劃外，廣東胡都督（漢民）統一財政之說，實為切要之圖。所謂各省先行預備金，組織總機關，發行民國紙幣，各省一律流通一節，於餉源關係尤鉅。惟設立地點，發行額數，各預備現金若干？自應亟電鄂軍政府議決，仍希望各省協同力進，以偉大民族，共建偉大國家，雄視五洲，當無倫比。敢佈下菲，曷勝翹盼，湘都督譚延闓叩。」

舉足輕重肆應四方

在這一篇通電裏，譚延闓首度公開表示他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愛戴與崇敬，以及他服膺中國同盟會所作的政治主張，力贊胡漢民提出的「統一財政之說」。而他願見中國統一，實行民主共和的強烈願望，更是躍然紙上，情見乎詞。以此可以證明譚延闓在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發表「禱電」，宣佈湖南自治宗旨，使所謂省憲運動首起於湖南，純係抗拒北洋軍閥勢力侵入湖南的一時因應之計。聯省自治運動創始者，急先鋒這一類的稱號，實不應加諸於譚延闓。因為如所週知，「通而有節」如譚延闓先生，他的革命立場，政治主張始終是一以貫之，從未脫離三民主義的範疇。

在軍事方面，辛亥革命初期譚延闓由於湖南居於舉足輕重，肆應四方的中堅地位，使他儼然成爲最高戰略的釐訂者。證據之一，如譚延闓曾在規復荆襄後致電鄂軍政府，指出荆襄爲革命軍所光復後，清軍必將注意窺伺南京，「擾我腹心」，所以他從而擬訂全盤戰略——「我軍自應猛力進據河南，西進陝西，南扼漢口一帶，

抄出賊兵後路，則漢口不攻自破。再用支隊游擊山東，而後會師北進，則南京可以無虞，賊亦有瓜熟蒂落之勢，天下可定也。」適足以表現譚延闓深諳兵法，具有軍事學的才能，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非僅徒以文學天才見長而已。

證據之二，當年鄂軍政府在和戰大計、與敵交涉方面，經常都是請決於譚延闓，而非常尊重他的意見。譚延闓則更是料敵必中，能夠適時的拿出辦法來。辛亥十一月初，鄂軍政府即曾致電譚氏，向他有所請示，即可作為例證之一。這一個電報的原文如下：

「……頃有英領事遣代表來言數次，謂已與北京美使出名担保，欲令武漢三鎮不再作為戰場。鄙意擬先提出四條：

- 一、敵兵須令全數退出武勝關以北。
 - 二、該軍隊退時，我兵不得追襲。
 - 三、敵軍各種輜重，准其攜回。
 - 四、兩方面如有背約時，担保國須負責任。
- 敵處本知此事奇詭，不宜置議。惟該領言明日又有人來探訊，須措詞回覆。尊意對於此事何如？乞詳加指示，迅即賜覆，以便應付。」

譚延闓獲電後，迅於十一月初六（十二月二十五日）電覆鄂軍政府。他首先分析清軍央託英美使節求和，原因不外乎以下四點其中之一：

- 一、北方有特別變動事由發生。
- 二、因民國軍隊四集，遂謀厚集兵力，以劃分南北界限，藉圖以全力注重山陝等處。

三、因滿清昔日勢力範圍條約，而出於外交團之主動。

四、爲和議決裂之準備。

然後，他「指示」應付此一事件的原則，——「民國既經舉定外交總長（從十二月十八日起在上海與清廷代表唐紹儀舉行南北和議的伍廷芳，他在臨時大總統府尙未成立以前，先被舉爲軍政府外交總長，以便與清廷進行和議。）似應移歸總長對付，以謀統一，方爲正辦。但既歸外交總長核辦，如不承認清軍北退，則應另擬進取辦法，而設詞對付英領。如允其退兵，則必由總長提出如左之條件：

一、北軍退出武勝關，所有地點，須由民國以兵佔領，不得視爲中立土地。

二、如和議不調，無論何人，不得干涉妨礙民國軍隊之行動。

三、武勝關外鐵道，不得毀壞。

四、漢陽兵工廠、鋼藥廠、鐵廠內所有兵械機件，全交民國管理，不得毀壞擲去。

以鄂軍政府原擬訂的退兵四條件，和譚延闓修訂的四條件相比，顯見譚延闓要高明得多了。

辛亥十一月初十（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十七省代表全體出席，湖南省的代表是譚人鳳、鄒代藩、廖名播。四天前甫自國外返抵上海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十六票當選。十一月十三日議決改正朔，用陽曆，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宣告誕生，勞苦功高的譚延闓，被任命爲湖南都督兼省長。（未完待續）

二次革命首先響應

譚延闓主持湖南軍民兩政，直到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晚間十時，袁世凱賄買凶手行刺國民黨代理事長

宋教仁於上海北火車站，陰謀竊國的猙獰面目終於顯現，四月中旬又開始秘密進行五國銀行大借款，企圖貸款二億五千萬英鎊，用以擴充北洋軍力，對南用兵，同時收買議員，羅致刺客，大舉清除異己。四月二十六日黃興致電袁世凱，力阻大借款的進行，並且把袁世凱的陰謀揭示天下，電文中有「應桂馨（刺宋案首犯）逆證中，內務部祕書洪述祖（刺宋案主事人）至望大借款成功，潤及凶頑，爲政府鋤除異己」之句，國民黨籍的三都督：廣東陳炯明，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之外，就唯有湖南都督譚延闓主持正義，起而響應。旋不久癸丑二次革命事起，譚延闓就堅定不移的始終站在國民黨這一邊。他言行一致，貫徹始終，充份表現了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男子漢大丈夫氣概。李劍農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第十章「國民黨與北洋軍閥鬥爭的初期」，分析國民黨在二次革命時期的形勢，有謂：「湘雖在國民黨手，譚延闓態度游移畏葸，軍隊亦不和。」其中「游移畏葸」四字，揆諸事實，未免有失公允。

譚延闓不但率先響應黃興力阻袁世凱進行借款案的通電，而且在二次革命，江西都督李烈鈞湖口舉義之初，旋即任命蔣翊武爲總司令，率領湘軍北伐討袁，師向荆襄，進圖中州。這時候黎元洪已經被袁世凱牢牢的抓住了小辮子，正以一面倒姿態甘爲袁家功狗，一面接納北洋軍大舉南下，一面接受袁世凱的命令以鄂督兼領贛督，替袁世凱扼守華中第一線。所以當蔣翊武調集澧州、常德一帶的部隊出擊湖北省境的石首、公安二縣，黎元洪即命荊州鎮守使丁槐率部抵禦。湘軍兵少，蔣翊武爲丁槐所敗，黎元洪總算念在譚延闓的金面，不曾使丁槐趁勝追擊，鏖入三湘。

二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鈞湖口起義，通電討袁，黃興則於十五日進入南京宣佈獨立。其後陸續通電獨立的省份，尤有七月十八日安徽、廣東，二十日福建，十九日上海，以及七月二十八日湖南譚延闓的正式宣佈參加討袁陣營。可是袁世凱的北洋勁旅却早已紛紛南來，二十五日湖口失陷，八月十八日北洋軍攻陷南昌，到了九月

中旬，北洋軍已將江西全境納入掌握，而先此八月五日龍濟光、龍覲光兩兄弟又奉袁世凱之命逐走廣東都督胡漢民，因而使得湖南三面是敵，險象環生。其間袁世凱還密派間諜炸燬了長沙的軍火庫，讓無兵無勇的譚延闓因處長沙無計可施，這才有八月十二日湖南為環境所迫，不得已取銷獨立之舉。九月十七日袁世凱正式對湖南用兵，派湯薈銘率領楚等有四艘淺水艦直抵岳陽，這是北洋勢力侵入湖南之始。三湘健兒面臨巨大壓力，一時無從抵抗，因為旋不久袁世凱又派北洋軍主力第三師曹錕，及第三十九混成旅伍祥禎部大舉入湘，袁世凱乾脆免了譚延闓的職，命黎元洪兼領湘督，黎元洪飲水思源，他能安然坐上民國副總統、湖北都督的寶座，辛亥那年譚延闓不避艱危，毅然揮師援鄂，他那一次忙可真幫得太大了。他怎好意思乘人之危，取譚延闓而代之？因此他向袁世凱極力請辭，順水推舟的荐舉湖北老鄉，袁世凱的鷹犬湯薈銘。

於是，十月七日，湯薈銘提重兵入長沙會晤譚延闓，十月十八日袁世凱就發表了以湯薈銘督湘的電令，他對主持湖南獨立討袁的兩位人物，都督譚延闓、師長趙恆惕分別予以不同的處置，命譚延闓即日入京，令將趙恆惕解往北京聽候處分。十一月十五日，北洋軍便正式入駐長沙。

黎元洪不忘譚延闓昔日的大德，唯恐譚延闓被迫入京以後，袁世凱把臉一翻，會有生命危險，特地發電袁世凱，力陳：

「譚延闓係被迫獨立，非其本心，曾仰藥以求解脫，元洪敢力保其無他。」

大義凜然誓死不屈

殊不料譚延闓置個人的生死安危於不顧，即令身在虎口，隨時可能遭遇不測，但他仍以「士可殺不可辱」的書生本色，光明磊落，大義凜然。於獲悉黎元洪急電力保以後，立刻發表通電，公開揭示：

「黎副總統心存愛護，力爲解免，延闈並非不知感激。但延闈通電宣佈湖南獨立之際，既未仰藥，亦未受迫。延闈身爲湖南都督，發號施令，權責在我，倘若政府治罪，一身甘當，決不走避。」

譚延闈在二次革命全面失敗以後，猶能以其坦蕩的胸襟，浩然的正氣，不推卸，不諉過，雖斧鉞加於前而色不稍變，像他這樣的慷慨義烈，反袁到底，安可以「畏葸游移」四字，遽予厚誣？

被迫入京後的兩位湖南硬漢，譚延闈被陸軍部判處四等有期徒刑，後經黎元洪極力說項，方在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由袁世凱下令特赦，僅予褫奪陸軍上將銜，「以示薄懲」。趙恆惕也由於黎元洪的「一言九鼎」，而於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以袁世凱下令改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俾免罹難。同年九月十三日，賴蔡松坡（錕）等之保，他也獲得特赦了。

民國五年三月，國父從日本返抵上海，主持討袁帝制戰爭，當時譚延闈已自北京脫身，也在上海居住。他由胡漢民陪同，首次謁見國父，從此他便矢志追隨此一革命偉人，唯國父之命是聽。五年，他奉國父委令籌組護國軍，再度討袁。五年六月袁世凱死，黎元洪繼，譚延闈乃在八月二度出任湖南都督，民國六年張勳在北京演出復辟醜劇，譚延闈變立即出兵聲討，湘軍都開到了鄂邊，段祺瑞先已馬廐誓師，逐走張勳。嗣後段祺瑞在北政府當權，解散國會，廢棄約法，國父高揭護法大纛，譚延闈在段祺瑞實行其武力統一政策，派傅良佐、張敬堯統北洋軍入湘之際，他曾撥款六十萬元，令湘軍將領劉藩、林修梅等在零陵獨立，擁護國父的護法主張，作爲廣東護法基地的屏障。然後，當北洋軍進陷長沙，張敬堯奉北政府之命出任湖南都督，譚延闈便以湘軍總司令的名義，扼守零陵，設防於郴永之間，力抗北洋軍吳佩孚、張敬堯及馮玉祥，他在郴永一帶撫輯流亡，收容舊部，使他的麾下，又有了近萬人馬。而且一直堅守到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居然能把握吳佩孚自衡陽撤兵北上的機會，以兵不滿萬，槍兩千桿的一支湘軍，將爲禍三湘甚烈的張敬堯暨北軍駐湘各

部七萬餘衆的北洋勁旅，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而逃。六月十二日，湘軍總指揮趙恆惕攻克長沙，督軍譚延闓旋於十三日抵達，飽受北軍蹂躪的長沙市民歡欣若狂，家家戶戶都在燃鞭炮，街頭更是萬頭攢動，歡呼聲震天地，爭先恐後的歡迎譚延闓凱旋歸來。六月十四日，各公會團體假又一村舉行歡迎祝捷大會，譚延闓即席致詞，他一站起來就說：

「我們慚愧之不暇，怎當得起歡迎二字？回想過去的兩年多，桑梓之地陷於北軍掌握，我們是三千萬父老兄弟的罪人。由於我們過去不努力，苦我湘民一至於此，今天才得到一點點贖罪的機會……」

說得這裏，譚延闓已淚如泉湧，語不成聲，在場的人無不被他感動得淚下沾襟，嗚咽墜泣，這真是感人至深的一幕。

民國十一年三月，譚父開府廣州，成立大本營，譚延闓應邀赴穗，担任大本營的內政部長，五月調任建設部長兼大本營祕書長，後來又奉命組成討仇救國軍，就任湘軍總司令，親率湘中將領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等，迭次北伐，奮戰不懈，立下了無數汗馬功勞。九月一日，他奉 國父之命入長沙，十一月十二日，陳炯明和北洋軍閥勾結，攻陷石龍，分兵四路猛撲廣州。北洋軍蔡成勛已自江西進抵南雄，廣州危在旦夕。譚延闓所部正在湘粵邊境，他接到國父電令迅即回粵馳援，星夜進發，分頭堵截。先在始興大敗蔡成勛部，生擒其旅長高風蔚，然後馳抵廣州北郊，向凶猛來犯的陳炯明施以迎頭痛擊，經過整整一天的激戰，終將陳炯明部擊退，使廣州轉危爲安。

受命艱危湘軍北伐

民國十三年元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譚延闓被推選爲中央執行委員。當時，駐防廣州的有

滇軍、桂軍、粵軍、豫軍、黔軍，還有許多的零星部隊，但是據胡漢民說，其中仍以湘軍「統率爲最大，人數既衆，槍械又充實。」因爲湘軍計有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陳嘉祐的第一到第五，一共是五個軍。然而滇桂二軍却把持廣州市區地盤，壟斷稅收，斂財自肥的官兵頗不在少。於是滇桂軍不愁餉源匱乏，薪餉給養遠在各軍之上，而人多勢壯，戰功彪炳的湘軍自總司令譚延闓以下，却祇能按日發放官長伙食四毫，士兵兩毫，幾難維持溫飽。這淺淺之數的伙食費，由於大元帥府公費支絀，還得每天一次去領。有的時候竟然沒法領到。在這種強烈對照的情況之下，滇桂軍當然很怕湘軍會憤懣不平，攬奪他們的地盤和財賂，但是深明大義，以精誠團結爲重的譚延闓却正告他們說：

「現在敵軍既已退回東江，我們就不該再逗留後方，自求暇逸。我們應該趕緊前進，將敵人消滅，掃除革命的障礙。」

譚延闓大聲疾呼，力促駐穗各軍急起進攻，可是滇桂諸軍却毫不爲動。胡漢民曾經說過，在這一段時期之內的湘軍是：

「……祇有譚先生獨提湘軍，努力猛進。誰知給養既不足，水土又不服。所以沒有接戰，湘軍之以病傷亡者，已在半數以上。譚先生事後告人，這是他生平最傷心，最痛惜的一件事。但於此更可見譚先生服從總理，矢忠革命的一斑。」

到了十三年六月一日，國父鑒於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部，蹂躪地方，橫行無忌。對於黨的決議，根本置之不理。湘軍和粵軍反而備受他們的壓迫，感到非常之痛心。因此，他下令廣州各軍移駐郊外，藉收安定地方，避免摩擦之效。然而令下以後真正能遵行不渝的，也祇有湘軍和粵軍而已。

民國十三年九月五日，國父在大本營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督師北伐，分兵兩路進入湖南和江西。國父

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理大元帥職權，以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廖仲愷任軍需總監兼財政部長。十日又發表宣言，盡調各軍北上，可是，到同月十二日，國父移大本營於韶關，親自督師的時候，追隨他從事北伐的部隊就只有湘軍譚延闓、贛軍方本仁全部，和滇軍朱培德、豫軍樊鍾秀兩部各分兵一支。楊希閔的滇軍和劉震寰的桂軍，則依然盤踞廣州，把持稅收，陽奉陰違，仍還是不服。國父的調遣指揮。

受命艱危，譚延闓對於國父的命令，唯有服從，全無異議。反倒是胡漢民替他在國父跟前有所陳詞，胡漢民說：

「先生此次北上，要我們負起北伐、東征的責任，實在太難了。不過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勉力去做。據我的推測，肅清東江，似可不成問題，因爲我們已經養成精銳的黨軍足可勝任。至於北伐，便不能不替組菴爲難。第一、組菴統率的湘軍，祇是北伐軍隊中的一部，其他五六部是否能受命於組菴，便是一個很大的疑問。第二、組菴究竟不是軍人，即使其他部隊，能受組菴指揮，但組菴能否勝任也不能不稍稍顧慮。」

安時處順哀樂不入

胡漢民追述這一段往事的時候，曾經坦承他講話一向是這樣率真的。但是，他又提及當時譚延闓聽後却也不以爲異，他還會說：

「展堂的話十分在理。」

國父對於胡漢民這一番話的答覆，則爲：

「一切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儘管去做吧。」

胡漢民追憶的說：「儘管去做」，是國父應付一切艱難困苦的格言，所以他和譚延闓，當時便祇有唯唯

稱是。國父北上以後，胡漢民和譚延闓商量東征、北伐的計劃，並且研討如何處理廣州善後。譚延闓便慨然的担起北伐重任，他說：

「既然是總理主張了，不管難不難，我們都不能贊一詞，祇有努力去幹！」

試想，這種忠於領袖，勇於負責的態度，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東征、北伐，果如胡漢民的預料，由大本營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官學校校長 今總統蔣公所統率的黨軍，揮師東征；力克惠州，將叛軍陳炯明部全部擊潰。連克汕頭、潮州一役，迫使陳炯明二度潛逃香港。棉湖大捷，黨軍以教導團千餘之衆，力禦萬餘精悍之敵，卒將叛軍殘餘一舉肅清，由而獲得輝煌的勝利。但是，由譚延闓所率的北伐一軍，賴湘軍之奮勇前進，固曾深入江西贛州，直逼南昌，惜以其他部隊不遵譚延闓的命令，「走的走，亂的亂」，終使得勝之師轉爲敗績，又度自江西省境退回到廣東來。

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今總統蔣公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譚延闓任第二軍軍長，大軍北上，一路勢同破竹，國父的北伐中原，統一全國遺志，方始迅速完成。民國十六年東年底定，建都南京，譚延闓時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不久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出國考察，譚延闓便繼任國民政府主席，成爲中華民國的元首。十七年秋胡漢民回國後，中央常務委員會推舉 今總統蔣公爲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長，仍兼國民政府委員。

據胡漢民在譚延闓逝世以後表示，譚延闓的宿疾種源已久，他說他在廣州的時候，每每見到譚延闓行走不便，便關切的問他何以故？譚延闓曾經告訴胡漢民說：

「我找過醫生，據考驗的結果，斷定不是腳氣。即使有病，想來也沒有關係了。」

病痼難瘳氏失師保

但是譚延闓素來豪飲健飯，因此每逢他去看醫生，凡是准許他飲食自如的，他便認爲這位醫生通達，可以信得過他。倘若醫生想給他多立戒條，禁這忌那，他就期期然不以爲可，而說：

「我以前已經吃錯喝錯，何必現在戒它，反而使我感到痛苦呢。」

其後，曾有一位醫生，在爲譚延闓作過精密的檢查後，正告他說：

「以你的病狀，將來有兩種死法。其一是得急病，因腦溢血不治，其二是由半身不遂而逝。」

譚延闓曾經將這位醫生的診斷告訴過他的革命志友胡漢民，他說：

「這兩種死法，假使能够任我自擇，我必定擇其前者。因爲，倘若要我半身不遂個若干年，那就未免太使我難過了。」

由此，胡漢民認爲譚延闓的人生觀是抱定了「生與死爲萬物變化之迹」的主張，近乎莊子的「養生主」論。生死既爲人類所不能逃脫，如果悅之惡之甚至爲苟全性命計而勉強節制自己，那就全然失却生趣了。胡漢民說：

「這真是能知『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便『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胡漢民說：

「我以爲一個有懷抱——能做事業的人，對於生死，總有一個超人的見解。不過，假如普通人本來就沒有什麼知識，却不能以此作爲藉口，以致放縱頹廢，弄到馬援之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這一層是大家所應有的認識」。

不過，當年爲譚延闓精確檢查的那位醫生，他的診斷却有些似是而非。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三次

全國代表大會，譚延闓復被推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仍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當時討逆軍興，大戰方殷，蔣主席北上督師，任譚延闓維持後方之重責，他黽勉治公，夙夜匪懈，身體已是相當的勞累。九月二十一日適逢週末，他抽暇休憩身心。因爲譚延闓平生的嗜好除了寫字作詩便是看馬，他曾自許他有伯樂相馬之才。這一天他便到南京郊外小營小遊，由於看馬過久，體力不支，突如其來的發了病，侍從急忙扶他上車駛返寓邸，到家時譚延闓卽已知覺全失，服藥既不能，打針又不可，致使羣醫爲之束手。延至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長逝，享年五十二歲。胡漢民爲之悲痛萬分的說：

「老成凋謝，我們爲國家設想，爲本黨設想，該是何等重大損失！」

譚氏逝世噩耗傳出，舉國爲之愴悼。國民政府明令國葬，在襄揚令中尤且盛讚他說：

「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德量醇深，謨猷宏遠。辛亥之役建樹湘中，應援鄂緒，克奏光復之勛。嗣後討袁護法諸役力持正義，大節儼然。暨乎壬戌癸亥之際，手挈湘軍，追隨總理，入襄至計，出奏膚功。爲主義引效忠，固初衷之不懈。於以宏濟艱難，克定危難，從容坐鎮，政績弼昭。方今大亂漸平，國賴耆碩，何圖汗謨未盡，痼疾難瘳，天不憖遺，民失師保，遽聞溘逝，痛悼殊深。着由財政部撥治喪費一萬元，派鈕永建等前往治喪。所有節終典禮，務極隆重，以示政府崇功報德之至意。」

譚延闓的靈魄安葬於南京鍾山靈谷寺，八德功水之前，墓碑由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今總統蔣公親題，文曰：

「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長、前國民政府主席譚公延闓之神道碑。」

由於國人對於譚延闓之欽敬崇仰，靈谷寺前譚墓，其後也成爲南京郊外的名勝之一。